

宋词通史

肖鹏 著



凤凰出版社

宋词通史

· 肖鹏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宋词通史 / 肖鹏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506-1755-1

I. ①宋… II. ①肖… III. ①宋词—词曲史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200号

- 书 名 宋词通史
著 者 肖 鹏
责 任 编 辑 王爱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 226300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66.75
字 数 96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755-1
定 价 15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3-80237871)

文学史书写新范式的诞生

——肖鹏《宋词通史》的学术转型意义

王兆鹏

自1904年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著)问世,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念体系和稳定的书写范式。范式的确立,既标志着学科的成熟,也预示着思维的固化。所以,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学界就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呼唤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诞生。但如何更新观念、转换思维、改变方法,“重写”出新型的文学史,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始终是停留在理论思考层面,而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实践性成果。令人欣慰的是,肖鹏新近完成的《宋词通史》,却实现了人们的期待。其书的体例结构、历史观念、研究方法和话语系统都是全新的。我觉得,肖鹏此书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史书写新范式的诞生,是文学史书写方法的重大转型和突破,有着学术转型的意义。

一、体例:从以线串点的线性结构 到断面交织的立体结构

本书最大的创新点、对今后词史乃至整个文学史的书写最具有范型意义的,是体例结构的创新。体例结构,不单纯是一个章节安排的形式问题,而是涉及述史者(史官)如何呈现历史的原生态、怎样书写历史的进程等观念问题。

表面看来,本书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正史体例,用本纪、世家、列传、表、志来叙述词史,似乎是一种复古,实则用全新的历史观念、现代意识、科学

方法和话语系统彻底改造了正史体例的内核。他只是借用了人们熟知的正史体例的外壳,内容结构则是全新的。那种无所依傍的创新会让人惊异而拒斥,在人们熟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则容易被接受认同。这也给我们如何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建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新的研究范式、话语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创新,无疑要有现代意识、科学精神,但也要植根于本土文化。

过往文学史的体例结构,可以概括为“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式的线性结构。用时间的线索串连起述史者所认为的重点作家,就能达到预设目的了。在串起这些重点作家的同时,叙述者也注意到了每个时期文学史的阶段性变化,比如,人们常常会把宋代文学史、词史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或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或概括为萌芽期、发展期、鼎盛期、转型期、深化期、衰落期。这些分期看起来脉络分明,变化有序,但是否符合文学史、词史的实际,很难检验。文学史的发展变化未必就是这样井然有序,文学史的原生态原本是多元的、复杂的、丛生的,有回环往复,有进化,有倒退,也有停滞,人为切割的时段越光鲜整齐,越让人心存疑问。更何况这种对数十年一个时段的大跨度、长时空的描述,往往会忽略许多变化的具体过程、环节。有时变化可能就发生在一年或更短的节点,有时可能十数年或更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变化。

“以线串点”,只有点线而没有面,只能见到作家个体,而见不到作家群体。虽然“以点带面”,可以补充点线的不足,略有面的呈现,但“以点带面”突出的还是点(个体和重点作家),面只是浮光掠影而已,模糊不清。也就是说,每个时期或时段的文坛和词坛,只能看到少数几个重点作家在各自为战,看不到整个文坛、词坛作家的互动和集团作战,看不清文坛、词坛的整体面貌。

肖鹏在对过往文学史书写的病灶进行深入的把脉问诊之后,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建构出新的体例结构:断面粘连、点线面交织。

他从地球科学中地球生命史的断层研究法获得启示,对词史进行断面研究。这种断面研究,表面上与传统文学史的分期研究有些近似,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期研究是主观的切割,而断面研究则是客观的依历

史的自然年轮进行适当的区分。分期研究是大跨度的宏观观察,断面研究则是短时段的微观透视。具体说来,他按照两宋词史发展演变的自然生态,依帝王更迭的时序(稍有合并),将两宋词史分为十个“断朝词坛”,即十个阶段,依次为:太祖太宗词坛、真宗词坛、仁宗词坛、英神哲宗词坛、徽宗词坛、高宗词坛、孝宗词坛、光宁宗词坛、理宗词坛和度宗元初词坛。每个词坛周期长短不等,短的25年(如真宗词坛),长的41年(如仁宗词坛),每个周期平均30多年。每个“断朝词坛”,又以10年为一个年代,分为若干个“断代词坛”。十个断朝词坛又被细分为二十九个断代词坛,如仁宗词坛分为天圣词坛、明道词坛、庆历词坛和皇祐词坛,高宗词坛分为建炎词坛、前绍兴词坛、中绍兴词坛、后绍兴词坛等。这些断朝、断代词坛基本是宋词发展的原生态。

书中的“本纪”,就是依时间顺序叙述各断朝、断代词坛词人群的活动和创作。在这十年中,哪些词人进场、哪些词人退场、哪些词人在场活动,创作了哪些作品?彼此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冲突与联系?创作上有哪些互动?哪些词人形成了什么样的群体,这些群体各有哪些特征和标志?群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什么时候解体的?群体跟地缘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地域特征?除介绍重要词人之外,每个断朝词坛还设立一节“词坛在籍词人序列”,列举该阶段有哪些“前朝词人”继续在此期活动,有哪些“新生代词人”进场创作。这样,各个“断面”有段(时段)、有线(不同时段构成长时间序列)、有点(个体词人)、有面(词人群体和整个断朝词坛),断面与断面紧密粘连,构成立体的网状结构,词史的原生态和多元复杂的格局在此得到有序的全景呈现。

这种结构方式,较之过往文学史点线结构的优长之处在于:

重点词人更加突出(在本纪的大事编年和词人关系志中他们永远是聚焦的主角,在传记中他们要么是以“世家”的身份出现,要么有独立的列传予以重点介绍),次重点、非重点和通常认为不入流的一般词人也各有各的位置,元老和新进、精英与草根、知名及不知名的,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

词史的时段变化更加明了。词史的变化,已不再是以数十年为一个

周期来宏观扫描,而是以十年甚至更短的时段来盘点,其间的发展过程、环节和局部变化,呈现得更具体细致。

词坛的断层面貌更加清晰。每个断代词坛,既有个体词人独立的活动与创作,又有词人群体的多元联系和密切互动。各个断代词坛的舞台上不仅有个唱专场,更有合唱团的大合唱、众多演出团体的大会演。

从修史传统来说,这种结构模式是既吸收了纪传体的格局,又融入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的一些特点,当然更有现代的科学思维。这种体例结构,不仅有范式的启发意义,更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意义。它标志着文学史书写的思维更细密、方法更科学,更贴近文学史的原生态,由粗放走向精致,由模糊走向清晰。文学史的书写,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层级。这种体例结构,能不能成为未来文学史书写的主流方式,还难以预期,但对现有结构模式的冲击和解构是显而易见的,被更多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借鉴吸收,也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借鉴和吸收,不是照搬本纪、世家和纪传的方式,而是创造性地运用“断面粘连、点线面交织”的结构方法和思维路向。

二、史观:从选择过滤到全景呈现

体例,是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史观,是回答为什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写文学史,文学史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不同的述史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主张。肖鹏撰写词史,特别注意用现代意识,挖掘宋词的普世价值和意义。自由与尊严、责任与担当,是其史观中的关键词。自由和尊严,在全书分别出现 97 次和 52 次。关键词的高频使用,体现出作者强烈地自觉地推崇创作自由、崇尚文学要有尊严的意识。这种观念,在过往文学史中不能说没有,至少是不很突出。因为强调创作自由,所以它对扼杀创作自由的做法进行无情的鞭挞,对恶搞之类没有尊严的文学进行严厉的针砭。且看下面两段文字:

即使撇开治国平天下不谈,这个叫做赵佶的人,他为宋词史所贡献的这点曲子词作品,远远抵不上他对宋词史所犯下的罪孽。他亲手终结了伟大的元祐时代。曾经那样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而又温暖的,百家争鸣热闹非凡的,诗词艺术如此享有独立和尊严的,那个永远让人难以忘怀的词坛,词人纵情歌唱,心灵在平等自由的碰撞中一次次激发出绝世的才情,激动人心的这一切,如今都消失了,走远了,没有了。大师走远了,自由走远了,真正的艺术走远了。只剩下一些蝇营狗苟的阿谀奉承之徒,围在帝王和奸臣的身边,写一些精致的垃圾。

这种谐谑恶搞,正在成为今天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主流。我们注意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品热、无厘头热、黄段子热、二人转热、网络恶搞热、审丑起哄热、PS跟贴热、非主流热……放眼望去,满眼都是装疯卖傻,嬉皮涎脸,没一点正经。人们争相遮掩起自己的真实表情,说话故意用错别字、孩儿腔,相互插科打诨。从电视到网络,从出版物到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沉溺在这种恶谑文化中。仿佛人生除了哈哈一笑,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是浮云,不值得当真。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解构,轰然倒塌。再没有庄严,再没有敬畏,没有永恒,也没有真诚和期待。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值得我们终生守望的东西,都变得荒唐无聊,而被人们嗤之以鼻。我们要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怎么了?我们的社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的族人为什么重新又变得这样玩世不恭?将来子孙后代会不会也轻蔑地说我们是文妖?九百年前的堕落时代,竟然这样眼熟啊。这宋词读的,让人冷汗涔涔。

肖鹏写史,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当下的人文关怀。观念变了,评价的标准、认识的角度也变了。过往的文学史,何曾这样评判过宋徽宗!何曾这样评论过北宋末年曹组等人的滑稽词!何曾与当下的文化现象进行过这样的对比与剖析!

在强调自由和尊严的同时，他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他热情讴歌词史上敢于担当的英雄，礼赞有责任感的国士：

国士，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激情来承担天下的。这是他张元幹与舅舅向子谨的不同。向子谨的隐居是彻底放弃，是完全隐身，是割断一切痛苦和纠缠。张元幹的致仕隐居，是形隐而心不隐，尽管在野，却全身心地关注着国家命运。一旦历史走到重要关头，便挺身而出，舍命相搏。用仁宗朝老臣范镇当年的话来说，叫做：“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岂敢忘记天下苍生。他可以放弃富贵和官爵，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却不能放弃承担天下。所以才特别值得我们徘徊再三，千载之下也要以手加额，向他致敬。

国士区别于名士、谋士最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正面承担了伟大的历史使命。民族的兴亡，道义的盛衰，文化的传承，维系在他们身上。这些并不是他们的社会职责，而是一种主动前来的挺身担当。这就把他们与那些职业政治家和帝王将相划分了开来。这种操守，来自于他们坚定的儒家人格信仰。古人常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只是一般文人士大夫的两条精神底线。进为天下谋，退为自身谋。真正的国士从来不做这样的选择题。他们是不顾一切，都要把这两条准则叠加起来的，任何时候都一个不能少：仕途顺达的时候要坚持操守、承担天下使命；仕途潦倒落魄的时候，也要坚持操守、承担天下使命。这样的人，才配被我们永远仰望，才配被后人封圣祭拜。

至于写什么，过往的文学史各有侧重，但求真、求善、求美，是一致的立场。真实地描述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揭示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是过往文学史家的共识。这当然没有错。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的天性。但作为真实呈现文学历史进程的文学史，这样的指导思想、这样的价值取向，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味求真、求善、求美，假、恶、丑和非真、非善、非美的东西就被屏蔽、

被隔离。文学史上只见表达真情实感、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品,那表达假感情、表现假生活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只见意境高远的作品,那意境狭小的作品是什么模样? 只见艺术技巧高超的作品,那艺术技巧拙劣的作品是什么状况? 只见审美趣味高尚的作品,那审美趣味低下的作品是什么情形? 没有真假、善恶、美丑、好坏的对比,我们的读者怎样去区分? 怎样提高他们的是非鉴别能力、对文学细菌的免疫能力、对作品的审美欣赏能力? 不让人了解什么是不好的,怎能让人领会什么是好的?!

一味求真、求善、求美,文学历史的原生态就不复存在。还原的不是文学史发生时的完整现场,而是经选择过滤了的部分场景。部分被特写镜头放大,部分又被忽略、舍弃或模糊处理。文学史发展进程的真相被人为掩盖,这与我们号称要真实描述文学史发展进程的初衷是否有些悖离? 毕竟,文学发展进程中,包括个体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真、善、美与非真、非善、非美的东西并存。

这种选择性的文学史观,是不是该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

肖鹏提出“全景呈现”的文学史观,是对传统的选择性文学史观的挑战和反拨!

所谓“全景呈现”,就是还原历史的原生态。还原历史,文学史学已经讨论过N回了,好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和招数。我们通常所说的还原历史,是弄清历史的真相,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还原出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和真实全貌,弄清楚它的前因后果。问题是,弄清楚后又怎么叙述、怎么呈现历史的真相? 或者说怎样进行还原性的文学史叙述? 正是在叙述层面上,“还原历史”又回到了价值选择上,客观的历史真相被主观的选择过滤所替代,只叙述好的,不叙述坏的,只叙述进步的,不叙述落后的,只叙述真善美,不叙述假恶丑。“还原”的初衷一到叙述操作层面就被“选择”所替换。还原变成了无法兑现的光荣与梦想。

肖鹏的“全景呈现”,是在叙述操作层面完整呈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个方面。落实到个体词人的叙述上,是全面关注和分析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崇高和渺小、他创造的精华和垃圾。世家和列传对传主的处理,不再是留下他模糊的身影,而是拉近镜头,扩大像素,清晰地展现词人

的外貌和内心。作者在书中明确宣称：

我们认为，历史应该被全景呈现，不能这样精挑细选地部分讲述，部分却装着没有看见。就像媒体新闻，你只要告诉大众发生了什么，其他判断和选择，应该由大众自己作出决定。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先来精挑细选，然后告诉你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这既是最安全的做法，也是最接近古代先贤的做法。“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们每个人都读过。我们需要的是秉笔直书，有什么写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史德。因此，我们在宋词史的叙述中，不仅会谈论那些优秀词人的贡献，为古人唱赞歌，也常常把那些有缺陷的作家和典型的垃圾作品牵扯出来，讲述他们的罪愆和过失，讲述词坛的丑陋和病灶。比如北宋后期广为流行的淫俗词、谀颂词，南宋后期泛滥成灾的江湖散语体词。不引用他们的作品，我们怎么能交代清楚被当时人诅咒的黄庭坚？怎么能交代清楚大晟府的时代主旋律？怎么能够让读者相信宋词老了，宋词正在生病？

谈论具体词人也需要这样的全景呈现。对于那些伟大的词人，除了歌颂赞美之外，我们也毫不避讳地谈论他们的人格缺陷，他们存在的问题。例如他们政治上的天真，人格上的偏执，行为上的不检点，等等。甚至所有的重要词人，我们都涉及到了他们的性格缺陷，触及到了向来学者们避讳谈论的那些负面特征。人无完人，哪能没有缺点呢？不谈论人的缺点，你的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历史。就像没有阴影，你不可能得到立体的影像。这决不是什么低俗猎奇，更不是故意为难古人，挑剔前贤，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原生态历史，是严肃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第三方观察。历史学家代表的是时间，是整个民族。我们是前来审查词人的，不是前来献花的，哪怕他是我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哪怕我们私下里也极端崇拜他们，也得秉笔直书。没有平视，就没有心灵对话，也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真相。

可以这样说，在百余年来的文学史著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书像肖鹏的

词史这样关注过词人外在的长相、容貌、身材(书中除随文评点词人的外貌之外,还专门列有《宋代主要美男子词人一览表》、《宋代部分貌丑词人一览表》、《宋代部分瘦削矮小词人一览表》、《宋代部分高大壮硕词人一览表》)。词人不再是以素描式的轮廓出现,而是用高清相机拍摄的人物特写登场亮相),也没有哪一部书如此透析过词人内在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们人格个性中的缺陷。关注词人的外在形象,不是猎奇,而是“通过观察外在形象来阅读词人的内在性格,通过分析生理行为来探寻心理倾向。通过体格、性格、人格的比对互证,来理解他们的审美选择,来领略宋词的美妙无极”。这大概与他从事电视职业、特别注重视觉感受和人物形象有关。

即便是苏轼这样偶像级的伟大词人,肖鹏对他的性格缺陷和人生历程中并不伟大的行为表现也是秉笔直书,如他这样评述苏轼从海南归来后的词作:

苏轼战胜了命运,没有被击倒。但是诗神(曲子词之神)已经不再眷顾他。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皇太后沿用旧例听政,开始召回元祐旧党。苏轼离开海南岛北归,路过韶州时,曲江令陈缜(公密)为他洗尘接风,酒席上苏轼老人眼睛盯着侍女素娘,目不转睛,写下了最后一首创作时间可考的《鹧鸪天》词。让人仰天叹息的是,这根本不是一阕命运的悲歌,不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人间绝唱,而是一首带着轻佻味道的香艳词。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九死一生的老人手笔。

文学史的“全景呈现”,不仅在于立体呈现个体词人的外貌和内心、优点和缺点、功劳和过失,还在于全景呈现好人和坏人、忠臣和奸佞。受选择性文学史观的支配,过往的文学史绝对不会也没有给蔡京这样早就钉在历史耻辱柱的奸臣立传,可肖鹏的词史,为蔡京立了专传,因为蔡京是大晟词人族的核心,是那个时代主流文化的象征。属于凡例中所说的“创作成就一般、但在词人群体中扮演重要角色者”。他在蔡京传中这样评析

蔡京晚年被流放时写的《西江月》词：

细细打量这首小词，这首曾经沾满了细菌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什么？八十岁的老翁，从天堂坠落到地上，满怀的羞愤、怨毒，满耳的诅咒、哭喊，也许半夜还有满眼的冤魂、厉鬼，他会良心发现吗？没有。我们只看到他追忆当年五度入相、彤庭宣麻的辉煌，以对比眼下的凄凉。没有忏悔，没有负罪内疚，对天下苍生造成那么巨大的灾难，甚至王朝的毁灭都是他间接造下的孽，却没有一点点悔意。只是后悔自己不该贪恋荣华，落到今天的地步。早点退下来就好了。奸佞就是奸佞，永远只斟酌着自己的得失。

这样写负面人物，不同样也有意义么！我忽然觉得，现代的文学史官，似乎不如古代史官大气、自信。古人修史，至少还立个《奸臣传》、《佞幸传》、《酷吏传》之类来真实呈现负面人物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干脆把负面人物统统屏蔽掉，仿佛文学史上原本不存在这些人物。在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史里，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全景呈现”，除了个体人物的好坏都写、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同样关注之外，还有第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也都要尊重。按照肖鹏的说法，“每个生命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关注。这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全景呈现。”当然，“平等的关注”，并不是“平等的”用力。一代词史，人数众多。宋代有词作流传至今的作者共计一千四百多人，即使篇幅再大的词史著作，也不可能为每个人立传、用同等的篇幅来叙述他们。肖鹏的书写策略是，按对词史贡献的大小，分级处理。一千四百多词人，约分四级。一级词人，即“创造性地开辟了宋词新境界的杰出词人”，以世家名义为他们分别立传，大篇幅评述他们的词史贡献。名列世家的有七人：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二级词人，即著名词人、重要词人，以列传形式单独为他们树碑立传，这类词人有一百二十八人。三级词人，即值得关注的词人，这些人或随文传叙，或列名存目，简介其事迹，这类词人凡八十三人。四级词人，即一般词作者，只是列

名每个断代“词坛在籍词人序列”中,亦即仅仅是名字出现而已,没有事迹和作品的介绍。至于哪些词人该入哪一级,其地位的重要性、艺术的创造性如何认定,目前还只能见仁见智,肖鹏也不可能提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证标准和方法。

概括说来,全景呈现的文学史观,落实到作家的操作层面是三句话:作家的正面和负面都要论述,正面作家和负面作家都要关注,重要作家和普通作家都要顾及。我相信,“全景呈现”的文学史观,会成为今后文学史书写的新路标、新航向。

三、方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多元交叉

有了新史观、新体例,还要有新方法、新视角,才能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著作中,我不知道有哪一本书像肖鹏此书一样运用了这么多新的科学方法,涉猎了如此众多的学科领域,包括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学、中医学等等。所谓“新”方法,是相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这些方法,在其他科学领域,可能只是一种常规的方法,而当它第一次被移植到文学史研究中来,它就成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方法。

在肖鹏尝试用的新方法中,我觉得最有启示的,一是断层研究法。他借鉴地球物理学中的断层研究思维以及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史的断面研究,详实地说明了这种断面研究的思维理路和操作过程,并用此方法对宋词发展的年轮作了极富创意的划分(详前)。我们可以参照肖鹏的尝试,对宋诗、宋文的断朝诗坛、文坛进行类似的划分与观察,当然也可用这种方法来考察汉唐和金元明清的各代各体文学史。

二是人口统计学方法。肖鹏多年从事电视传媒的市场战略研究,对数据统计和市场份额竞争,有很深的认识。借鉴这些方法,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宋代词人的生态分布,对宋代各个断朝词坛的人口总量(TPP)、人口密度(PDP)、加权人口总量(WAP)、阶层比重(CPP)、清

晰度指数(PCI)等,进行了科学的统计分析。特别是清晰度和阶层比重的分析,尤有价值。他根据宋代词人生平事迹清晰度和阶层比重的变化走向,得出了宋词作者队伍由社会上中层逐步走向下层底层的结论:

在徽钦词坛以前,中层士大夫词人始终占据着两宋各词坛的主流地位。这个“中产阶级时代”延续了一百多年。在后来的各个断朝词坛,他们也一直是创作的主流力量。宋词作品的大部分和精品的绝大部分,都来自这个阶层。但从整体上看,这个阶层的数量在不断萎缩,从最高的57%,下降到最后的11%。不能不让人感到痛心。

执政大臣群体同样有一个急剧减少的过程,而且幅度最大。从过去的中坚核心,最后边缘化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相比之下,社会下层的词人,见于记载的比例相当稳定,波动幅度很小,略有浮动而已。身份不详的词人最夸张,他们不断蚕食各个阶层的份额,成为其他阶层的无情吞噬者。到宋词落幕的时候,词坛上已经是一片黑压压的模糊身影。这不是宋词的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宋词的无家可归,被社会冷淡和抛弃。宋词就这样,走失在茫茫人海中,一天天衰微了。

宋词作者队伍变化的这一千年未发之秘,一朝被统计数据所揭穿,让人感到意外又新鲜,不得不信服。这里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文学史研究来说,实在是一个诱人而科学的方法。在此我特别友情提示文学史研究者,如果借鉴这种方法去观察其他时代作家队伍的变化,一定会有许多新鲜的发现。

三是用植物学的植物群落生态分类方法来研究词人群体。群体,是肖鹏研究词史的主要切口和视角,“词人群”和“群体”是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关键词(全书分别使用692次和360次)。他借鉴植物学分类的方法,提出了词人群、词人群组、亚词人群、词人族等概念。每代词人群,又分群核心(致密层)、群主体(稳定常态层)、群外围(松散游离层)、非群词人(周边生态)等。各个代群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列成图表,一目了然。

四是用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人格类型测量学等中西医学理论方法来研究词人的体格类型、人格类型、性格类型。文学研究中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作家的心理性格,其实说不上新鲜,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前辈就已有过尝试,八九十年代,更成为流行的热门研究方法。然而,肖鹏用精神病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词人负面的病态人格或人格障碍,这在此前的文学研究著作中还比较少见。如他根据史料的记载,分析潘阆的行为表现,非常接近“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钱惟演有焦虑性人格障碍(Anx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倾向;林逋有封闭型人格障碍(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秦观存在一定程度的意志薄弱型人格障碍(Weak-willed personality disorder);晏幾道除有社交恐惧和陌生人恐惧(Zenophobia)之外,可能还有逃避型人格障碍(Avoi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及孤独障碍(Autistic disorder);王安石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Fanatic personality),又称诡辩型人格、狂信型人格;辛弃疾的人格特征则是自我中心型(Egocentricity);姜夔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人格自恋倾向,或者叫做人格洁癖;米芾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Histrionic personality);刘过则接近于爆发型人格(Explosive personality)。

他分析的结论,我们可以不全信。他自己也未必全信。正如他在《凡例》中所说的:“这些叙述表达意在激起思维涟漪,带来阅读联想,并非不可商榷的词史定论。”但他的思路和方法,非常有启发性。原来作家还可以这样来分析!不仅有趣,而且有用。至少对古代词人的种种异常行为表现做了一次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做了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和体检。让我们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们还可以用书中提及的方法来分析自我和身边的熟人。书中使用过的种种人格类型、精神分析方法,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在生活中有实用价值。

这些新史观、新体例和新方法,几乎建构出了一套全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这种范式,不仅有明确的理论观念作指导,有具体的结构模型和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而且学理性和操作性兼备,经得起重复检验。我相信,这一全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同、借鉴与完善。

四、话语：学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既为没有本土的话语体系而焦虑，也为话语的程式化、枯燥化而郁闷。批评的概念照搬西方，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批评的语言常常没有可读性，使人读来味同嚼蜡、昏昏欲睡。而肖鹏的词史，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话语系统。

他的话语是学术的，又是文学的；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既合乎学术化的规范严谨，又具有文学化的生动形象。生新中含有似曾相识的成份，熟语中别饶引人思索的新意。不再是呆板的，而是多变的。有庄重，也有俏皮；有严肃，也有活泼。有传统的术语，也有时尚的新词。有智慧的闪光，有思想的烛照，有感情的渲染。也许像李白的诗、东坡的词，这天生生的好言语，不容易学习和模仿，但启示我们，重建本土化的话语系统是可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语言可以不那么学院化、艰深化，做到学理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也是可能的。成功的范本，就在眼前。

肖鹏提出和定义了一套新的概念术语。他借用西方传记学者的观点，提出“修史五要”，其中之一就是“要勇于定义新的概念范畴”。诸如词人群组、词人族群、断朝词坛、断代词坛、词坛人口密度、词坛清晰度指数、词人阶层比重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意义和功能指向都定义得一清二楚，既有针对性，又有普适性。既适用于词学研究，也适用于各种断代和分体文学史研究。

我特别注意到，他在叙述中有意识放弃了艰深的学术概念，不使用时髦的政治术语和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语言，刻意保持古雅干净的自然语言状态。许多斑驳古旧的传统语辞，出现在他的行文里面。这与他所叙述的内容显得特别和谐。他不与别人激烈争论观点，只是潜心于自己的体会描述。他使用了一套个性化的叙述和分析语言。词学研究中常用的意境、意象、情景交融和豪放、婉约等，已不再是关键词，代之以既有专业术语的元素又有口语化、生活化和日常化倾向的新话语，是一种经过转换